



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

杨树达传略

白吉庵



杨树达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。字遇夫、号积微，晚更号耐林翁，生于1885年6月1日。其父杨孝秩，字翰仙，性笃厚，少时勤学，喜读史籍、唐宋古文，於科举帖括程式不甚措意，故屡试不第，后为塾师。杨树达6岁从其父学。稍长，父授以《尔雅》、《广雅》、《史通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书，而树达尤好汉书，每读一篇，不忍释手。11岁时，其父始教作文，因不喜应试之八股文，令作论说文，常以史事命题。13岁入时务学堂，时梁启超为中文教总习，以《孟子》及《公羊春秋》为教本，鼓吹民权主义，学生思想为之一变，杨也深受其影响。次年因病辍学。15岁遵父命从湘潭叶德辉受业，叶谓《说文解字》为治群书之梯航，《四库提要》为读群书之响导，故以此二书授之。后来杨在学术上的成就，得此二书之力多矣。1900年16岁，转入官办之求实书院，学经史、算学、英文等课。嗣后读书颇勤，开始治《易经》，并仿阮元《诗书古训》列。辑有《周易古义》文稿。1904年应湖南省院试、第一名交卷，学使批云：“鎔经铸史，卓尔不

群，少年得此，尤为可喜”。不久调入校经堂肄业。次年，被派往日本留学，入东京宏文学院大冢分校普通第二班学日语。1908年转入正则学校学英语。次年预科毕业，被派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。1911年，辛亥革命胜利，清廷官费停止，他只好中途退学回国。返湘后，遇求实书院老同学陈润霖在湖南军政府任教育司长，介绍他去担任图书科科长。次年改任湖南图书编译局编译员，并兼楚怡工业学校英语教员。1913年应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之聘，到该校讲授国文法。从此广泛阅读语法书籍，发现《马氏文通》有许多错误，立志今后要补其不足。次年“四师”与“一师”合并，改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旋因主持者易人而辞职。1916年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，在此任教四年，环境安定，于是有著述之意。1918年辑《老子古义》，以五十日而成，继而撰《盐铁论》、《论衡》等书之校注，均未完成而止。

1919年“五四”爱国运动的浪潮，波及全国。湖南教育界陈润霖、朱剑凡等发起“健学会”响应北京大学提出的反对旧礼教、提倡白话文等革命号召，杨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。当时湖南军阀张敬尧对群众的爱国行为，进行了残酷镇压，民愤大激，湖南爆发了“驱张运动”。是年冬，他被推为教育界代表之一，与毛泽东、罗教铎等联袂进京请愿。临行前曾语友人曰：“义无反顾，事在必行，吾意决矣。”表现了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。到北京后，北洋政府置之不理，结果杨等被困居都城，为了生计他将旧译稿，日本人著的《儿童个性之研究》，托人拿去出版，得稿费百元，以此渡日。次年6月张敬尧被迫离湘，杨等方返回长沙。在此前后，他写了《马氏文通刊误》及《中国语法纲要》等书稿。

1920年，北洋军阀内部爆发了直皖战争，皖系段祺瑞失败。直系上台后，改组内阁，范源廉被任命为教育总长。范为杨时务学堂同学。杨闻讯后再度北上，希望在北京谋一工作。后经过熊崇煦、黎锦熙等人的推荐，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任职，主

要是编辞典，在外兼任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日语教员。是年杨著的白话文语法《中国语法纲要》由北京商务出版，并得到教育部的奖金。10月，撰《文字之省略》一文，对于《礼记檀弓篇》“而曰尔何无罪欤”这句话，杨认为是语急之省。原文当为“而曰汝无罪，而何无罪欤”。时曾子发怒，语急，故句不完全。此文由《学艺》杂志发表后，钱玄同见之称赞说，《檀弓》之文得君始解云云。次年由钱介绍他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法教员，所编之讲义，即为后来出版的《高等国文法》一书之底稿。

1922年5月，他应吴承仕之约，参加吴发起的“思辨社”，以文会友、每两周集会一次。第一次集会的有程炎震、洪泽丞、邵瑞彭，孙人和等人，后来陆续入社的有陈垣、高步瀛、陈世宜（字匪石）等人。此社为学术性质，没有坚持多久也就分散了。9月致书胡适，讨论《诗经·召南·采芣》中“于以采芣，于沼于沚”二句。胡解为一问一答，“于”字义为何处。杨认为：“于”训何处，古训无据，又“以”字无着，且上下两句“于”字异训，皆未妥。他的意见：“以”字假借为“台”，《书经》屡见，而“台”从以声，故可通“台”训为何。三“于”字同训“在”。这样文从字顺，较为合适。胡适得信后，放弃前说而从杨议。后来见面，称此讨论，甚有结果，并对杨的训诂学给以很高评价。同年，兼任教育部之编审员。1923年7月“高师”改为北京师范大学，范源廉出任校长。因人事变动，国文系主任章崧辞职，于是范请杨继任，杨以学力不胜辞之，不允，后改为代理。范上任后本想干一番事业，改变师大旧貌，后因经费长期无着，他想整顿学校的雄心壮志，一筹莫展，不得不于次年9月辞职出走。杨与师大同人到国务院请愿，并赶到天津去挽留，后因范坚辞不就而罢。此后杨亦有离开师大之意。1925年《汉书补注补正》出版，是书纠正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六百余事，成绩显著，为杨多年心血的结晶，也是他代表作之一。余嘉锡赞曰：杨诵班

孟坚书，不复持本，终卷不失一字。古所谓汉圣者，无以远过。黄侃评说：“遇夫于汉书有发疑正读之功，文章不及葵园（王先谦字），而学问则过之矣。”由此可见，杨对《汉书》的功力，及其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。

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，由于梁启超的推荐杨到国文系任教授，师大由吴承仕继任其职。次年9月正式到清华就职，在此与朱自清、陈寅恪、王国维等相识，其后常有往还。这时他对音韵学颇感兴趣，填表终日，不觉其劳，间有所得，常与钱玄同等研讨。他非常同意钱的古音对转分为四种之说：一对转、二调转、三音近转、四双声转。并认为黄侃古韵分为二十八部，系采前人之成说，无所发明，然为之最后，得集前人之成，故尤便于后学也。至于以十九纽（声母）隶各，字乃黄侃之独创，值得称赞云云。同年，《老子古义》与《周易古义》相继出版。这两部书是他青年时代之初作，距出版时已二三十年矣。他在序言中说：“忆青灯之有味，循览是编，盖不胜其掩卷太息之情也。”大有忆往事，恨时光倏忽之意。1928年，《词诠》出版，是书收集虚词四百七十余字，依王引之《经传释词》体例，编辑而成。他将各家学说，经过择决，举证而为一家之言，尤便初学。在解释汉语虚词方面，他用语法去分析，说明字的词性。这就是把清人用训诂学讲虚词的办法，提高到运用语法去分析的科学高度。在这方面他比过去诸家前进了一步。当时他以此书赠胡适，胡赞之为传世之作，并将它列入他当时所编的中学生参考书目中，供青年学习。此书至今仍不失为学习古汉语较好的工具书之一。

1929年，梁启超病逝，继王国维之后，清华又故去一位国学大师，他万分悲痛。出殡日他以弟子礼执紼送葬，表示非常崇敬。不久与余嘉锡（字季豫）相识，二人一见如故。因久已慕名，于是互赠书籍，谈经说史，甚为融洽。杨称：“余来京，交友求

益之意颇殷，而湘人居京者，无一真读书人，得嘉锡可弥此缺憾矣。”后来杨出版《极微居小学金石论丛》一书，请余作序。余着重介绍了他的治学方法，谓：“杨之治学，先致力于根柢，循序渐进，不陵节而施。其於说文讽籀极熟，於群经讲贯极精，然后上溯钟鼎甲骨之文以识其字，旁通诸子百家之书以证其义。由是考览诸史及汉魏人文字金石刻辞，辄怡然以解”云云。由此可见，他少年时从父学《尔雅》，从师学《说文》等书，对他后来的发展影响颇大。

1930年6月，日本学界用庚子赔款招待中国学者访日。杨与张贻惠、陈映璜、曾仲鲁等前往。7月1日，船抵大阪，参观朝日新闻社，都岛工业学校等单位。2日，抵京都，他们在此参观了京都大学图书馆，见所藏唐人写的《玉篇》残叶，及《白氏文集》、宋本《韩柳文集》、《册府元龟》残本等，后者我国所无。11日，到东京参观帝国大学图书馆，并到内阁文库观其藏书，在此又看到许多中国的善本书流落在此，他们感到惊异和愤慨。一天，东京文理科大学诸桥博士来访，见面极赞杨之《周易古义》及《老子古义》二书，并称他讲授《老子》，即以杨著为教本云云。此外，他们还参观了一些学校，与当地的学者进行了交流，18日，离东京返国。回到北京时，他所著的《高等国文法》已出版，并收到商务寄来的赠书十册。他感到意外高兴，将书分赠友人。是书为他多年来语法教学与科研的总结，它虽没有突破前人的框架，但资料丰富，比较详细地订正了《马氏文通》之误，且树立了以划分词类为中心的语法体系。从这点上来看，在当时它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语法书。因此出版后受到国内外的重视，乃至后来被选为大学丛书出版，这不是没有理由的。他在序言中谈学习语法的心得时说：“治国学者必明训诂，通文法。明训诂而不通文法，其训诂之学必不精；通文法而不明训诂，则其文法之学亦必不至也。”可见语法对读古书之重要。这是他经验之谈，也是以前学者王引

之，马建忠等不足之处。当时学界对这书的评价是很高的，贺昌群称此书，“取刘（淇）王（引之）俞（樾）之旧迹，循《马氏文通》之新法，折衷其间，最为杰出。自有此书，而词类始明晰，余盖不足论”云云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日本桥川时雄来访，杨痛责日军入侵我东北之无理，义正词严。桥川理屈词穷，不敢深辩。后来，逐渐疏远之。杨曾告友人，谓时雄为何如人，吾不能知，不如绝之之为愈也。同年《马氏文通刊误》出版。是书为作者十年前后，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汇编，书中举评马氏失误共有十类：一不明理论；二所见不明，致词与组织动摇不定；三强以外国之文法律中文，失中文固有之神味；四不知文有省略；五强分不当；六不识古文有错综变化，泥於词位，误加解释；七误认组织；八误定词类；九不明音韵故训；十误读古书。逐条详述之，语其精确。杨对马著虽然指出很多缺点，但他对马著的历史意义仍给以较高的评价。他说：“自《马氏文通》之出，而我国始有文法之书，其功伟大，不俟论矣。”是书出版后，他认为文法三书（《高等国文法》、《词诠》、《马氏文通刊误》）已出，研究语法的工作当告一段落了。于是另辟蹊径，转向金石学领域，从文字方面下功夫。

他在清华讲授《汉书》时，学生常问及汉代典章制度，因此广泛涉猎汉碑，时有新获，或是讲授，或是著文，皆受欢迎。他在回忆录说：“治金石学实始于此”。之后，他将所编的《汉俗史讲义》及《汉碑考证》，分别赠胡适、陈寅恪等。胡回信说，解决了他对鲍永等是否行三年丧之疑，表示佩服。陈则赞曰，“汉事专家，公为第一，可称汉圣”，并约杨到历史系去兼课。他表示同意，自谓：“余于《汉书》治之颇勤，诸公皆当代知名学者，其言如出一口，足见真实之业，自有真赏音，益喜吾道之不孤矣。”从此杨兼任国文与历史两系的教授。

1932年春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进犯上海，于是爆发了“一二八”松沪抗战。当时南方动乱，章太炎与黄侃于3月来京避难，吴承仕设宴招待，约杨作陪，始识太炎先生。章见面称赞杨著之《古书疑义举例续补》一书，并告杨的师叶德辉去世时曾撰诔词云云。黄侃一旁称赞《词诠》不失为雅言之作。不久，黄侃返宁，嘱骆鸿凯向杨致意云：“北京治国学诸君，自吴承仕，钱玄同外，余嘉锡、杨树达二君皆不愧为教授，其他则不敢知也。”可见当时杨在国学方面的成就，非同凡响。那时，吴宓主办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，以纪念班固诞生一千九百年，约杨撰文纪念之。杨义不容辞，撰“汉书所据史料”一文应其请。是文从九个方面阐述《汉书》资料之来源，说明班固博采前修，成此巨著，功劳不小，从而驳斥宋代郑樵所谓《汉书》抄袭《史记》，为抄袭而无耻之论调。杨称：“叙述史事，岂能凭空结撰？若以此罪班氏，则史迁之采摭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、《世本》及《楚汉春秋》；不亦同为抄袭乎？而郑氏不讥，抑又何也？”杨郑重指出：“班氏广泛采撷，材料丰富，不惟不当为罪，而其书之所以杰出，正在于此。最后他感叹地说：“创业之难工，古今同然，非独一人一事矣。”

是年秋，清华通知杨树达可以休假半年，他利用教授休假机会返湘省亲。居家无事，遂重拾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、《广雅》等书研习之。依声近则义近之说，他发现形声字声类有假借现象，于是以此类推，收集到声联义之例证数百条。当时他将此收获告来访之曾运乾，曾赞誉之为妙达神旨，是一大成果。嗣杨以此为题，应邀到湖南大学演讲。他说我国文字形声字占绝大多数，以《说文》为例，九千三百多字中就有七千余为形声字，因此研究文字语源当以此为对象，故在这方面他下的功夫大，而收获也不小。后来他将其心得整理成《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》一文公开发表，澄清了那种形声字义但寓于形，而不在声的认识，对研究

《说文》是一个贡献，赢得学界之好评。次年，《中国修辞学》出版。初，杨在撰《古书疑义举例续补》时，见俞氏书中有修辞一项，杨打算扩充它，使成为专科之学，后因故未成。后来他在清华讲修辞学，广泛收集资料，积微成巨，为此专著。这也是他治学的一种方法。在从事教育工作时，不忘记积累资料，善于把教学与研究工作，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，这样才能收到有益的效果。此书的特点是撇开西方修辞学的架子，从中国古代语言之实际出发，故有民族形式之美。1953年徐特立同志在湖南与他见面时，甚赞此书，称其中有合于辩证法的见解云。1954年，此书再版。

1934年8月，杨在天津《大公报》发表《读商承祚君殷契佚存》一文，此为其研究甲骨文字之始。嗣后二十余年，甲骨、金石兼而治之，成论文有百余篇，专著四种。是年秋，在清华讲授文字学，以吴承仕六书条例为基础，编写讲义，但分类有所不同，如象形字，他分为五种：即纯形、杂形、省形、变形、符形等。讲课时务求其本源，说明字之由来，如“丹”为“髡”之初文，力为肋之初文，等等，皆受到学生之欢迎。为了配合教学，他编辑出版了《古声韵讨论集》，其中收钱大昕《古无轻唇音》，曾运乾《喻母古读考》，以及他自己的《之部古韵证》等六篇论文。他在序言中说：“读书必求其义，而古义寓于古音，以今音求古义，犹适燕代而南其辕也。”因此，他认为治学，首当明古今音之分辨，这样才能读懂古文。

这时，陈独秀正在南京国民党监狱中坐牢，研究文字学，闻此书出版，函请在京友人邓以蛰代购一册。一天，邓偶遇杨树达告以：陈托购书事，杨即交邓二册，请其转致陈。杨与陈始终未曾见过，但偶有书信往还。杨读陈之《实庵字说》时，谓狱辱二字说与余同，至于卧、监、临三字，从目不从臣的解释，语甚精确，但其他有多处是主观意断。陈致书与杨，排斥六书之说，杨回答说：“鄙意似觉不然。今人动称科学，凡学问皆为类别。六书亦前人研考文字现象加以类

别之称，如果去掉象形、会意之名，有人问日月与武信差别若何，将何以答之乎？若谓文字复杂，非六书所能包括，此由于后人分析之未精，非昔人之罪也。”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，陈被释出狱到武汉时，杨曾去函表示欣慰，并寄其近作二十余首，请陈指正。

1935年7月，应日本在北平学者的邀请，到东方文化协会演讲。他以湖南文化史为题发表演说，大意谓“自王船山后，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，因欲保持自己民族，故对外来侵略最敏感，吸收外来文化亦最力，且在全国为最先，如魏源之撰《海国图志》，主张‘师夷长技以制夷’；郭嵩寿、曾纪泽之主张向西方学习；光绪戊戌年之办新政，等等，皆是其例。”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华北，杨作此演讲的目的，希望与会者能领略他的意思，对日有些警惕。同年10月，黄侃病逝，他闻讯感到震惊。他评论黄侃对“《说文》烂熟，然其所推论，多出于悬揣，不足据信。”并称“此君读书多，而识解不足；强于记忆，而弱于通悟”等等。

1936年，他将近年来研究文字学的心得，及发表在杂志上的部分文章，集为《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》一书，交商务出版，初遭拒绝。后托胡适说项，才允其请。是书对古代文字的解释，颇有新意，特别是对声训学阐述得更为透彻，在学术界轰动一时。余嘉锡在序言中说：“每一篇成，余伸纸疾读，往往拍案叫绝。”杨对声训学是深有研究的。他在序言中说：“初读章太炎《文始》，则大好之。既而，以其说多不根据古义，又说形声字声不含义，则又疑之。遂发愤求形声字之说，于是悟形声声类有假借，如：慈字声类之兹即子；及同义字往往同源，如：贺、赏、贩诸字，其声符：加、尚、皮皆有增义，故《诗经、大雅、崧高》：“以赠申伯”中之赠字，传释为增。杨颇自得地说：以此二义释古文字，则左右逢其源，沛能若决江河也。”其友人孙人和尽数日之力读此书竟，极表倾服。6月，章太炎病逝，他十分悲痛，自谓“先

生于余多所奖励，年来屡思赴苏州求教，因循未果，今也悔之晚矣。”于是撰挽词云：“许郑是经师，恨我沈吟稽拱手。精专承谬赞，惟将黽勉答深知。”

1937年5月其父病重，杨返乡看望。7月，北平爆发芦沟桥事变，全面抗日战争开始。杨令其家属速离平返湘。8月，杨应湖南大学之聘到长沙从此定居湖南。次年，朱自清由云南来函，约杨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。杨以家属拖累，路途遥远而辞谢。10月随湖大疏散到湘西。

钱玄同于1939年1月病逝沦陷区北平，5月杨闻此噩耗，甚是悲痛，谓“十余年前，同任教清华，常相过从，甚为契好。”他回忆有一次和钱进城在车中闲话，钱对杨说：“你治学语必有证，讲求实事，不似湖南前辈之所为，而做人则完全湖南风度也。”杨回忆至此，觉得老友勉励，其情不敢忘怀。是年秋，撰“温故知新说”，论治学之道。他说：“温故而不能知新者，其病也庸；不温故而知新者，其病也妄，并称新与故为学问之两端，妄与庸为治学之两病，文字之学，其一事也。”他认为治学当求其新，但要有其来源，切忌空谈。后来他在日记里说，温故不能知新者，指黄侃而言，不温故而求知新者，说的是胡适。这是他对温故知新的见解，批评了两种倾向，从中也反映了他的治学方法。

湖大迁到辰溪后，敌人飞机不断来轰炸，毁屋伤人，师生们不得安宁。杨树达甚为愤慨，于是他在湖大开设“春秋大义”这门课，根据梁启超当年在时务学堂所授的经今文学，以《公羊传》为主，阐述《春秋》“复仇”“攘夷”之大义。他说：“自恨书生不能执戈卫国，乃述圣文，诏示后进，恶倭寇、明素志也。”1944年《春秋大义述》出版，他又说：“此书之出，弥补吾不能执戈杀贼之恨，且鞞鼓声中有著述问世，已是幸事，不能以平时论矣。”

次年，在湖大校方的支持下，他和曾运乾、黄子通编辑出版了《文哲丛刊》杂志。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《读孙海波甲骨文编

记》一文。以前杨由于生活动荡不安，又忙于教学，所以治甲骨没能坚持下来。近来情况有所改善，故而重整旧业。这时杨读《观堂集林》中有关甲骨文的论述，对王国维之造诣赞叹不已。他认为王国维的长处，在能于平板无味、事实罗列之中，得其条理，故说来毫不着力。当他读郭沫若《两周金文辞大系》时，则评论说：“觉可商之处颇多。”这些是他当时读书的心得体会，说明他在学习中能发现问题，肯动脑筋、多思，所以他的收获也比别人大得多。1942年教育部学术审议会，根据他在学术上的贡献，评议给他二等学术奖，奖金伍千元。（时一等奖二人、为华罗庚与冯友兰。）其后，教育部发表部聘教授名单，杨名列其中，因而作诗记之：“平生百事不关情，身似蟬鱼老伴经。只有青山来好梦，可怜百发换浮名。惊心骨肉稀人在，放眼河山有泪倾。喜道孙逴逃虎口，乱来玄鬓几星星。”诗中除抒怀外，对祖国大好河山被敌人践踏，表示极大愤慨，而对畏友陈寅恪由香港脱险，回到桂林，流露出喜悦心情。此后不久，杨请陈为“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”作序。次年1月陈序寄到，称“先生设教三十年，寂寞勤苦，著书高数尺，为海内外学术之林所传确”表示对杨十分敬佩。

1945年1月，曾运乾病逝辰溪，杨失知交，无比伤心。前者部聘教授，曾未被评上，杨甚抱不平。后因学校风潮，曾有归隐志，杨竭力慰留才止，不数月即故去。杨谓“一代宗师，逝于荒村，良可痛悼”。并称“湘士在有清一代，大抵治宋儒之学，自道光间魏源治今文学，承其流者有王闿运、王先谦、皮锡瑞等，然治今文学者，皆不由小学入。故湘中学者上承东汉许慎、郑玄之学，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，进而治经者，数百年来惟曾运乾一人而已。其《喻母古读考》，乃世之学者所公认之也。”他们二人交往莫逆，一起共事，骤然承别，能无痛乎？故杨挽之曰：“鍾期一去牙弦绝，惠子言徂郢质亡。”语虽不多，但比喻恰当。之

后，他又作《曾星笠传》，记其行状及学术贡献，并呈请政府明令褒扬。

同年9月，日本战败投降，八年抗战宣告结束，万众欢庆。10月，杨携家随校返回长沙嶽麓山本校，从此结束颠沛流离艰苦生活，他想在此暮年之际，多做一些学问。于是每日钻研甲骨文，并着手编撰《说文读若探源》，将过去怀之数载，未遑笔录之心得，全部写出来，说明许慎在《说文》一书中，释音著“读若”之来由。据他考证，许氏所举读若凡八百余事，来源不止一端，可别为四：一是经籍异文。如《诗经》“逝将去女”，而《书经》“誓将去女”，誓、逝为异文。二是本字假借，如《尔雅》“璧大六寸谓之宣”，借宣为珣，故曰珣读若宣。三是重文，如麓菴一字，因为文字中鹿与录为通假，故知录读如鹿。四是前人之成说，如谱读若笄，本郑玄注《周礼》而推论之也。杨以八十余天的时间，寻出162字之来历，在过去诸家众说纷纭中，得出一个条理，这对研究《说文》又是一大贡献。是稿完成后，他又开始撰“声训学”，发表了不少这方面有价值的文章

1947年8月，沈兼士在北平逝世，他得讯后很痛心，他认为治国学的人，多逃难就易，治小学，而兼士独治义诂。治义诂者海内惟他二人。今沈死只剩他一人了，挽沈联曰：“治学耻逃难，独精义诂。著书方在道，遽哭先生。”同年杨被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，名下称其为：“继承清代朴学风气，整理古书，研究古文法与古文字学，皆有显著成绩云”。嗣后，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决定，授予古文字学研究二等奖。

翌年9月应邀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及院士会议。会后出席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茶话会，与所内同行相见，并应傅斯年之请作学术演讲。杨以《诗经·齐风·东方之日》，及《周颂·天作》二章为题，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，谓这两首诗，汉人误加训释，遂使辞义沈晦二千余年云。（详见《积

微居小学述林》)同时被邀的余嘉锡也有精采之演讲。会后由沪返湘。旋即应中山大学之约,赴广州作短期讲学。在此拜会了陈寅恪、商衍鎤、钱穆等学人,互赠书籍,交流学术,甚为愉快。他讲学之余,游览了当地名胜古迹,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凭吊,谓“今来参谒,怆感百端,盖今党人秉政,权利唯恐于后,死者有知,能无痛哭!”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现象,流露出不满情绪。后来学校派人送给他薪金金元券千余万,实值港币伍元,他说:“此乃国民党人之赐也”。

1949年4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后,广州一片混乱,学校已无法上课,杨只得返回湖南。这时他过去的同事邹谦由台湾来书,约往任教,他置之不理。同年8月湖南解放,他参军的孩子回长沙来看他,父子分别一十二载,欢聚一堂,感到格外高兴。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,他非常感动,谓“衰暮之年,或可及见昇平,余之幸也”。寻应《民主报》之约,奋笔撰文祝贺全国政协首届会议召开,题为《实事求是》。他写道:“清代皖派汉学家戴东原等标榜实事求是,故学派超越汉唐。今中国共产党治军,行政概以实事求是为口号,且能付诸实践,建国必成、决无可疑。”

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他更加高兴,作《赋怀》一首,谓“清秋有佳日,伴作李园行。门外青山好,厨中手饌精。三年遁宿诺,大地庆新生。忽有哦诗兴,晨鸡偶一鸣。”诗中说应人之请,三年未得诺,而今国家新生,方有诗兴来答报,欢乐之情,跃然纸上。其后,他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《实践论》,称赞此书详审致密,并说道:“列宁、斯大林、毛泽东三位伟人,不惟有政治才,且有学识,我国古来君师合一之象,今日见之矣。”后来他积极参加政治学习,尽可能联系实际。有一次,他请工人来修理床棚,工人把棚叫厅子。开始他听不懂,过了一会,想到这正合于《说文》里的解释:厅训床前程子。于是他说:“信

哉！向群众学习之有益也”。他得此启发，遂收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，准备用口语来解释《说文》，为研究这部巨著另辟蹊径。经过数年功夫，积累了一些资料，但没来得及整理，就去世了，稿子也不明下落，很可惜！

1950年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，11月他被聘为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，后为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。其后他研究金文甲骨更为努力，日有所获则笔录之。那时顾颉刚在译《尚书》，向他借《尚书》札记，他无保留地将全部笔记寄去，顾答书谢曰：《大诰》“猷大诰尔多邦”，此句自王伯申以来“猷”在“诰”下，已成定说。今得尊著，以金文校之，知猷为叹词，实为之快绝，并称“今后翻译诸篇，悉以先生之说为圭臬”云。

1951年10月1日，他被邀请参加湖南长沙举行的国庆观礼，感慨万千，曾赋诗云：“热泪纵横不自休，暮年喜见此年头。夜门兀自无人闭，谷粒都归种者收，淮水安澜歌大德，夷人授首洗前羞。平生梦想今都现，笑口颜开待首丘”。在这首诗里，他满怀激情歌颂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气象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，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，不断向前进步。后来他读斯大林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》，称此书“简明扼要，读之，有如石投水之乐”。

次年，《积微居金文说》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。此为他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。是书集中了1941年到1951年他的读书札记，释金文约三百余字，对前人解释不当之处，多有驳证，为研究此学，开拓了新的境界。当时有学生请教治金文的方法。他在序言里作了回答，他说：“每释一器，首求字形之无忤，终期文义之大安。初因字以求义，继复因义而定字。义有不合，则活用其字形，借助文法，乞灵于声韵，以假读通之”。此外他又写了《新识字之由来》一文，将其经验归纳为十四条：一据说文释字；二据甲文释字；三据甲文定偏旁释字；四据铭文释字；五据形体释字；六据文义释字；七据古礼俗释字；八义近形

旁任作；九音近声旁任作；十古文形繁；十一古文形简；十二古文象形会意字加声旁；十三古文位置与篆文不同；十四二字形近混用。他逐条详细加以介绍，最后称其为从实践中来之理论，藉以求教当世君子云。是年12月以人民代表身分，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会议第二届第一次会议，选举省主席及省政协委员。旋即被任命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。

1953年，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“汉字整理组”，编印《汉字简化综合资料表》，拟向各方面征求意见，以便推进文字改革工作。当时他对改革汉字有不同意见，于是向毛泽东同志写信，提出自己的看法。同年，他将已往研读甲骨文的心得整理成《积微居甲骨文说·卜辞锁记》，交科学院出版。是书收集了他自1944年以来的研究成果，在王国维、郭沫若研究的基础上，有所创新。他的研究方法是，依据说文求其形，以古韵求其声之通假，再据经史以明史实，如是知其义，则可得条贯也。他在序言里说：“虽余所得渺小，不能望王、郭两君，然余治此学所由之径途固康庄大道，此差可自信不疑”。继此书之后，他又出版了同类性质的书，书名叫《耐林廐甲文说·卜辞求义》。同年，湖南院系调整，他被调到师范学院任教，在著述工作之余，他还积极为历史系及语文系的青年教师讲课，为培养新生力量做贡献。因此受到学校的好评。

由于杨树达在学术上的贡献，科学院拟调他到北京来工作。1954年2月，教育部函湖南师范学院征求意见，他表示同意，后来考虑年老多病，不去为宜，故而辞谢。同年，他将已往研究古代文字的成果，分门别类整理成三卷，共释字一百廿余，定名为“积微居小学述林”交科学院出版。在序言里，他着重介绍了他的治学思想，他说：“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，是受欧洲文字语源学的影响。少年留学日本，学外国文字，知其有所谓语源学。翻检他们大字典，每一个字语都明明白白，心窃羨之。因此我后来

治文字学，尽量寻找语源，研究方法与前人不同，略而言之可分为六项：一、进行比较研究；二、务求不受前人之束缚；三、批判地研究《说文》；四、除经传外，尽量采用现代语言材料；五、运用古韵及甲骨文、金文；六、以形义密合之法，死死抓紧不放。他的这些经验，是将西方的语源学与中国的传统考据学结合起来，经过自己实践而得出来的，对治古文字学有指导意义。至于这部书的成就，他说：发现初文是我这书的一个重要收获。有时发现一个字，便一连串地将一些向从来没有说明白的字都说通了。是书完成后，他又将过去的石印本《论语古义》增订出版。是书乃杨之案头书，时有所得补之于上。以经证经，以史证经，间下己意，材料翔实，新意递出，为此书特点。陈寅恪在序言里说：“自来诂释《论语》者所未有，诚可为治经者辟一途径，树一新模楷也”。是年12月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北京召开，他被邀为委员，但因病未能出席。

1955年10月，中国科学院召开“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”，杨应邀来京出席这次会议，同时拜访在京故旧。时值科学院下属各所正在拟定著述规划，响应党中央提出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，他激情洋溢地接受了哲学研究所委托校注“盐铁论”的任务，同时又应语言研究所的研究项目《说文今语疏证》。他常说，虽已年迈，但不落后，要立志以著述报国。在京期间，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接见，他感到很荣幸。11月返湘，马上开始工作，原定一年的任务，他只用了五十天，就完成“盐铁论校注”。这种速度是惊人的，遗憾的是书稿完成后，不到十天，次年2月14日他就一病不起，与世长辞了。

杨树达一生勤勤恳恳，埋头业务，认真教学，四十余年如一日地忘我工作，学生遍及海内外，专著二十余部，论文百余篇，为我国语言文字学做出了卓越贡献，值得后人永远怀念。